

美国再工业化是否会发生

■ 赵伟

摘要:美国再工业化的确是个战略,但迄今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企业不买账!拿这样一个目前看来实现概率不大的战略当做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盲目跟进,不惜放弃中国自身稳定的战略利益,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根基,在于提升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让普通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收益。中国经济真正的希望,在于营造全球无与伦比的大市场!

近期参与国内一个高规格论坛,议论的一大主题是美国再工业化对于东亚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与产业的可能影响。占优的论点是:美国此举将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直接威胁,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是那些依赖美国企业外包、离岸等业务生存与发展的产业和企业。有一种推断,如若美国“重返”制造业,既搞研发和知识产权,又弄制造,最终囊括整个价值链,则那些原本依附在美国企业海外供应链上生存与扩张的东亚企业将可能遭殃,进而,东亚和中国的此类制造活动可能将归于衰落。由此引出的对策建议不少,其中两类建议最雷人,听上去也颇似有理:一个是不要急着促消费降低消费比重,还是应继续增加投资,借以营造制造业新优势;二是不要急着压企业给工人涨工资,更不要急着提高社保、医保水准。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推高劳动成本,进一步缩小美国和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差异,帮了美国再工业化的忙。

果真如此吗?我以为在讨论中国一边的对策之前,先得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说美国再工业化对于东亚和中国产业将是洪水猛兽的话,你先得搞清楚其发生的几率,直截了当的问题是,狼究竟会来吗?这个问题有四重,分别以何谓、何为、何以以及如何概括之。

何谓?什么是美国再工业化?美国政经界的解释很多,有说是重构美国资源于制造活动的一种战略,有说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战略设想。更多的是美国重返制造业。在我看来,这是美国政府受政客与政



党利益鼓捣出的一种战略构想,核心内涵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直接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何为?美国政府围绕再工业化的作为,为此迄今都做了些什么?客观地来看,围绕再工业化的美国朝野说得多但做得并不多,迄今勉强可以和这个战略扯上关系的大动作不过两招半。两招分别为“购买美货运动”和“促进制造业”。前者系奥巴马2009年上台伊始提出并力促的一种造势运动,旨在刺激美国出口减少进口,提出五年内美国出口翻番,借以创造就业机会。后者催生了一部法案,即《制造业增进法案》。2009年提出,次年经国会审议通过。法案提出一些措施增加就业,复活美国衰落的制造业。“半招”系一部近乎流产的法案,即《职业回国法案》。其主旨在于借助减免税收等财政杠杆,刺激美国企业把在海外的某些制造活动搬回本土。然而该法案2012年遭议会否决。2013年重新提交,但迄今尚未进入再审程序,何时能列入国会表决程序,尚属悬疑,通过的希望很渺茫。

何以?美国凭借哪些因素推动再工业化战略?客观地看确有一些因素。两类因素最突出:一类是民情民意。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背景,多半系一种民众情绪和政客热炒的“对接”。热炒的“素材”是“后危机”以降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滞后的巨大反差。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衰退只经历了6个季度,但就业恢复的节奏远远滞

后于经济增长,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而后美国民众那里,有一种新增的情绪,认为是美国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移往境外,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更有甚者,说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种情绪到了政客们那里,不仅成了热炒的话题,而且还得到智库库的研究支持。有论者将美国就业不振视为上世纪“去工业化”的结果。有论者证明,服务业虽能带来较高的收益,但其就业机会创造不及制造业。还有论者加上了别的“战略思维”。最具煽动性的是国家安全论。有政客甚至提出一种近乎闭关自守论的说辞:由于美国主要制造环节的“境外化”,工业品本土生产能力下降,一旦与主要供应链贸易伙伴发生冲突,贸易与供应链中断,将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由此将再工业化推上政府“战略”层面。

另一类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营造的优势。简单点说就是美国相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关键要素价格变动。各方谈及美国再工业化条件时最强调的要素价格有二:一为劳动力成本;二为能源价格。前者因中国劳动成本大幅度上涨和美国工资几乎未涨的相对变化结果,后者源自“页岩气革命”。由于发现了大量页岩气田并发明了有效的开采技术,美国天然气价格大跌,能源国际依赖程度大幅度下降。

现在看如何?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及前景如何?的确,上述诸因素的合力,外加美

后十年最大的贸易机会在农产品

■ 王海波

十几年大宗工业品的牛市已经转熊三年,后面是什么时段呢?难道都是熊市吗?很显然不是。

四年前我在清迈遇见澳洲某大学的政治系硕士,他们和政府有些研究项目,就是关于澳洲经济的走势和国家策略。那个时候,澳洲朝野经意识到中国的大宗工业品不可持续,要寻找替代产业,这就是农业。

我本来想邀请这位澳洲青年人和我一起做国际政治经济咨询研究,他也表达了这个意向,只是因为我后来忙于橡胶业,搁置了下来。实际上,中国近年来产生的转基因农作物之争,提供了更好的国际粮食贸易机会。

由于中国群氓意识占了上风,食品义和团和崔永元之流占据主流话语权,甚至迫使中国政府失声,在转基因农业上谨小慎微,可以很明瞭地知道中国的粮食危机会产生,也就是说会加重海外依赖,且越来越迅速。

中国在棉花上开放了转基因研究,自己的专业能力甚至把美国公司全线挤了出去,让棉花产业处于产能不败之地,后来国储行为差点毁灭了纺纱业不谈。大豆上是鲜明的对比,在国内妖魔化转基因食品后,中国政府不敢开放东北种植转基因大豆,结果导致大豆产业崩盘,只能依赖美洲大豆,不仅没有避免所谓转基因大豆的使用,而且整个产业毁灭了。到今天为止,中国人食用的几乎所有豆油和豆粕都是转基因。前一阵子榨油业集体洗船违约,除了融资套利行为形成的损害外,就是产地和定价权为美国人控制,导致中国产业几乎全线亏损。每年中国不仅仅流失大量财富,所有想要避免的都无法避免。

我清楚的认识到,妖魔化转基因会继续,在欧洲人已经意识到对转基因的恐惧是不必要的,从而开放食品领域的时候,中国正日趋保守。转基因技术最主要的性能在于防止虫害,并增加某些产品特性,如出油率。中国铺天盖地的农药损害,导致无数疾病,没有关心,却盯住一个从未发生疾病危害的特性,固然让人觉得可笑,但也会带给国际贸易机会。

可以想象中国铁定会失去玉米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机会,在水稻、小麦都方面仅仅依赖嫁接方式,进展缓慢。而中国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污染和干旱问题。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正让许多土地失去肥力,和污染导致的失去种植价值。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三分之二土地都陷入污染。

另一个非转基因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化,而非城市化,将导致农民转化缓慢,抛荒和继续占据宅基地的普遍现象,会继续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所以,未来玉米、水稻等都会被迫大规模进口。

种植产业方面,对抗海外转基因低价倾销的方式在于许多省份偷偷种植,不过在食品义和团的压力下,估计这部分也无法持续太多。未来中国因为粮食种植不足,低成本转基因作物会持续倾销中国,占据份额增大后,定价权就会转变,类似大豆一样,年年被操控上涨。

未来,即使是基础的食品方面,中国国民也将支付高昂代价,每年流失巨额财富。更可笑的是,进口的大部分都是转基因食品。在饥饿和精神恐惧中,我确信人们会大口吞咽转基因粮食,否则就不会出现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吃人事件。

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冒着被食品义和团打击和政府压迫的风险去种植转基因,进口会年年增加,保持国际贸易量就可以了。至少还能把一点点利润留在中国人手里。至于你的良心担忧不必要,因为没人会因为转基因断子绝孙,你在拯救中国人可怜的三十年财富积累,在矿产受到十几年压榨之后,在粮食上能救多少是多少吧。



激发城镇化的乘数效应

■ 易鹏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笼之后,马上就有地方推出了城乡一体化试点。观察一些方案可以发现,对于城镇化率的年度目标,城镇定位和布局,非常明确,特色鲜明。接下来,方案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把握好中央提出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有利于破解城镇化施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27.98%提升到2013年的53.7%,实现了大幅跨越,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很多问题也逐一显现,比如农民工的大城市化现象、粗放发展导致的城市病问题、大中小城市发展差距过大,以及由于土地城镇化率高于人口城镇化率导致“空城”“鬼城”“睡城”出现。

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主导城镇化发展时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一些地方“拍脑袋”决策,不顾未来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的风险盲目仓促开展项目;一些地方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希望通过建设新城获取更多土地的附着价值;一些地方仍然秉持“唯GDP论”,希望通过投资来推动GDP的增长。诚然,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有形的手”一旦被利益俘获,容易逾矩失范,让城镇化偏离正确方向。

正因如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如何理解“自然”二字?奥秘就藏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这一原则之中,让“无形的手”充分施展,让“有形的手”更有效率,实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双剑合璧,并以加速度变量的方式创造出城镇化的“乘数效应”。事实上,再精密的计算机,很多时候也难以比市场更精确、更理性,市场自会评估“鬼城”“空城”的建设风险,计算投资回报率。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的趋势出现之后,自然会形成产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良性格局,进而避免盲目决策,防止“大跃进式”的城镇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开宗明义地把“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作为基本原则,其深意就在于此。政府角色从“主导”变为“引导”,其引导作用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制定城市规划,实现城市高质量、集约、高效的发展;第二,制定规则和标准,比如环境标准,地下水排放标准,空气质量的基准,通过一系列标准来推动新型城镇化走向智慧发展的道路;第三,给社会创造一个公平、统一的市场秩序,并且要确立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合理边界;第四,严格执法,就是对制定的规章制度要予以监督以确保落地。

户籍、土地、财税、投融资、行政等一揽子改革都在新型城镇化的篮子中,城镇化本身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抓手。主导和引导,虽只有一字之差,却蕴含着复杂利益的调整过程,角色的转化过程,是重要的制度改革。能不能听懂市场的诉求,能不能做好对市场失灵的应对,能不能获得城镇化的“乘数效应”,则是对今后地方政府能力的一大考验。

互联网金融冲击存款形成倒逼效应



■ 余丰慧

截至3月31日,已发布2013年年报的11家上市银行中,有8家银行的活期存款占比较上一年有所下降。而互联网金融等对活期存款的影响越来越大。

互联网金融对活期存款的冲击,大小银行都不能幸免。从几家最“财大气粗”的国有商业银行来看,2013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末,工行个人存款全年仅增长5%;建行客户存款增幅仅为7.76%,较2012年末下降了581个百分点;农行2013年县域存款规模增速首次回到个位数增长。

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遭受了存款增速下滑的压力。光大银行活期存款占比较2012年下降4.45%;平安银行2013年末活期存款占比下降了2.3%;中信银行的活期存款占比下降2.1%;招行则下降了1.36%。

活期存款是银行最优质的资金来源。优质在成本低,存贷利差大,盈利空间大。低成本存款是各家银行竞争的重点资金来源业务。受互联网金融冲击活期存款下降对银行利润增长构成较大威胁。有机构以2013年中期的数据测算,如果有1%的活期存款转化为货币基金类理财,对银行2014年利润的影响是2%。

互联网金融对银行活期存款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各种货币基金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是任何金融产品都无法比拟的。比如:余额宝在短短7个月时间里客户量竟然达到8100万,基金规模达到5000亿元,在这么短时间里发展如此之快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对银行活期存款的冲击也是不可想象的。余额宝货币基金是从银行活期存款转入到支付宝进而进入到余额宝平台理财的。直接分流的是银行活期存款。

而支付宝平台有5亿客户,微信财富通有3亿客户。这么大客户量转移到活期存款的货币基金里,不但对银行冲击大,而且这种冲击力短时间里是不会减缓的。而且,支付宝又推出了娱乐宝,其火爆程度大于余额宝。如果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企业无休止推出宝宝类理财产品,那么,银行活期存款很难招架得住。

互联网金融对银行活期存款带来冲击形成了最少两大倒逼效应。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余额宝、微信财富通等各类宝宝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比存款利率高的多的回报率,主要原因在于利率管制的结果。由于银行存款利率管制使得管制利率与

国政府支持与政客煽情,或许能吸引个别产业制造环境回归。但要促成企业外包业务的大规模回迁,障碍重重。最大的障碍不在制造业相对要素成本上,而在要素相对收益上。论及要素相对收益,两个大视野不能放过:一个是美国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极高的利润空间。金融、设计、研发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最赚钱的行业,利润空间高出制造业十倍至百倍。制造业最辛苦最难赚钱。这点已成为全球企业精英们的某种共识。另一个是基于中间品贸易与价值链分工的比较优势。当代国际分工基于中间品和价值链,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复古”,包揽从中间品制造再到最终品生产这样的全程活动,因为这样就违反了比较优势原理。这个原理的通俗化,就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历史、理论与现实一再证明,一家企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一旦违反这个原理,追求大而全甚至小而全,将归于失败。

两个视野合一起来判断,美国再工业化缺乏微观机理。常识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仅有政客们的热议和政府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激励政策,但若无一种微观机制,不能将企业和资本所有者的收益最大化意愿和战略目标对接,都不会产生多大的实质影响。产业发展方面,仅有民意而若和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背道而驰,也不会获得实质进展。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为再工业化提出的《职业回法案》遭致否决就是一种明证,该法案试图对移往海外企业征收20%的税收,结果遭致美国大佬强烈反对而搁浅。

综述不难得出:美国再工业化确是个战略,但迄今多半还停留在政府意愿和立法程序中,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做下去障碍重重。拿这样一个目前看来实现概率不大的战略当做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盲目跟进,不惜放弃中国自身稳定的战略利益,将是极大的错误!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根基,在于提升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让普通百姓分享改革的开放的收益。中国经济真正希望,在于营造全球无与伦比的大市场。这个世界,谁有市场谁就牛!

同业存款放开利率、管制利率与市场化理财产品回报率形成了套利空间,导致银行存款低利率水平对客户存款失去了吸引力,直接造成银行活期存款流失。

这再次说明,目前的存款管制利率已经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了。这种扭曲的管制利率与市场化融资高回报形成的双轨制弊端越来越大,甚至造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包括吸收资金在内的金融市场严重不公。互联网金融在倒逼存款利率尽快完全市场化。

互联网金融倒逼银行加快转型。互联网金融对银行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冲击暴露了银行创新的严重不足,暴露了银行在互联网新金融面前反应的迟钝,也让传统银行进行反思。出路在于改革创新求变。近期,多家银行对外披露了互联网金融战略。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尽快吸收互联网企业创新、提升客户体验的能力,在近期将推出一些结合互联网的创新产品,还会尽快推出B2B平台;中国银行已经成立了网络金融部,统筹规划并协调推进网络金融业务发展。

股份制银行也在积极谋划转型,最为典型的是平安银行推出了贷贷平安商务卡、口袋银行2.0、社区金融发展模式、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创新产品与服务。还成立了产品创新委员会,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将在2014年有长足发展。传统银行拥抱互联网新金融才是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最佳选择。

互联网金融最大的贡献是对中国经济急需激活民间资本包括草根资本投资消费贡献了巨大力量,这种新生力量只要能够保护好、发挥好,将会成为不弱于减税调控手段而且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刺激民间资本的有效工具。比如说,文化产业一直苦于没有资本投资而使其发展止步不前。而近期支付宝推出娱乐宝产品,支持电影、游戏等文化娱乐事业发展,几天时间预约投资高达30万客户。这种威力是传统金融无法做到的。

如果文化、教育以及其他一些经济项目都通过互联网金融类似余额宝、娱乐宝产品激活民间资本包括小额草根资本投资,潜力之大可想而知,全民资本投资就会很快被彻底激活。这对于稳增长的作用是任何措施都无法比拟的。

互联网金融将成为激活民间资本包括小额草根资本投资的重要平台和媒介,也必将成为草根百姓追求理财投资回报的最佳途径。